

跨文化外语教学思政研究

熊谊华,程妍

(上饶师范学院,江西上饶 334001)

[摘要]本文针对跨文化外语教学面临的西方意识形态渗透与工具理性困境,提出融入课程思政的整合路径。通过认知解构破除西方中心主义规训,分层深掘物质文化、制度文化与精神文化基因;依托数字技术赋能深化文化解码;构建“价值取向—问题导向—语言为本原”三原则框架,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转化为跨文化认知元语言。同时推动教师从“语言教练”向“文化阐释者”转型,培养学生批判思维与中国话语转译能力,最终实现语言教育与文化自觉的协同发展,为应对全球化认知博弈、守护文化多样性提供系统性解决方案。

[关键词]跨文化交际;课程思政

[中图分类号] G641; H319.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711X(2026)02-0104-03

doi:10.3969/j.issn.2096-711X.2026.02.034

[本刊网址] <http://www.hbxb.net>

在全球化深度演进与数字技术革新交织的时代语境下,跨文化外语教学已超越单纯的语言能力培养范畴,成为意识形态博弈与文明对话的前沿场域。当前,西方中心主义话语通过文化产品转译、语言符号渗透等隐性机制,持续冲击着学习者的文化认知根基。跨文化外语教学亟需突破意识形态渗透,加强课程思政建设,重构兼具人文性与价值性的教育范式。

一、外语教育的意识形态挑战

在全球化语境中,跨文化教学作为特殊的文化实践场域,始终处于身份政治与权力关系的张力网络之中。Skellton和Allen提出多重身份动态调适理论,在跨文化课堂中呈现为学习者文化认知的层叠建构过程——当个体携带种族、性别、阶层等差异化身份标记进入教学互动时,其文化经验的解码必然受到西方中心主义认知框架的规约。这种规约性在批判教育学视野中,本质上是文化场域权力关系的微观映射:正如Moon揭示的“斗争场域”理论,跨文化教学实践不可避免地成为意识形态博弈的具象空间。

这种权力博弈在教学素材选择维度表现得尤为显著。以好莱坞电影《功夫熊猫》《木兰》作为跨文化教学案例时,其三重文化转译策略——去语境化传统符号、植入西方价值预设、实施文化商品反向输出——实质上构成了隐蔽的认知殖民机制。当教师未加批判地使用此类素材进行“中国文化”教学时,可能导致学习者将东方主义的他者镜像误认为文化本体这种转译机制不仅印证了萨义德关于东方主义的话语批判,更暴露了全球文化产业中隐蔽的权力运作逻辑——在文化多元主义的表象之下,实质是西方主导的符号体系对异文化进行的规训与收编。当熊猫功夫的视觉奇观取代了武侠文化的哲学内核,当孝道伦理被重构为个人英雄主义的成长叙事,这种“他者化”的文化表征便成为权力关系再生产的媒介。

这种意识形态渗透在语言教学维度呈现出更精微的运作形态。根据语言相对论(Sapir-Whorf Hypothesis),当学习者接触“military expansion”等暗含西方认知预设的术语时,其对中国海防作业的概念化过程已悄然接受特定意识形态框架。这种语言意识形态的认知重构效应,在涉及国家主权的

表述实践中具有特殊危险性:教材中“China, Taiwan, and Hong Kong”的并置表述,不仅构成对“一个中国”原则的解构,更可能通过符号系统的重复强化动摇学习者的国家认同根基。这正应和了伯特兰·罗素关于教育政治动机的警示——跨文化教学本质上是在塑造特定认知范式的“政治安全方舟”。

二、外语教育面临的困境

在全球知识生产体系深度变革的语境下,外语学科正遭遇前所未有的范式转型压力。近年来,外语专业报考人数不断下降,这不仅折射出生源市场的理性选择,更暴露出学科价值认知的集体焦虑。其结构性困境可解构为三重矛盾:其一,工具理性主导的认知范式将语言异化为技术性符码,遮蔽了其作为文化认知界面与思维建系统本体功能——当前英语教学仍普遍沿袭“词语分析—语法讲解—句型操练”的线性模式,将语言简化为符号系统的机械传授;其二,神经机器翻译在特定领域已达98.3%的语义保真度,从根本上动摇传统语言技能的评价体系;其三,学科定位的游移导致跨文化教学陷入方法论困境,当“外语+”专业以技术嫁接消解人文内核时,文化主体性的建构便面临被解构的风险。

这种范式危机在教学实践中呈现为文化认知的断裂性症候。历经四十年工具理性主导的发展周期,以“听说读写译”为核心的能力训练体系,虽造就了语言能力达标的“技术主体”,却催生出深层的文化认知赤字。调查显示,超半数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测试未达及格线,其认知困境体现在双重维度:一方面,传统教学将文化知识窄化为目的国的历史地理、文学艺术等静态背景介绍,虽有助于跨文化交际的浅层互动,却难以支撑价值内核的深度对话;另一方面,教师与学生普遍陷入“文化教学认知悖论”——87%的教师自认重视文化教学,但课堂观察显示仅12%的课时涉及文化批判性解码。这种认知脱节导致教学停留于单向度知识传递,未能构建“语言技能—人文知识—批判思维”的三维培养体系。

传统教学模式的局限性在国际传播场域形成镜像反射。当前外语教育存在“双重脱嵌”的结构性缺陷:在知识生产端,教材文化内容多停滞于节日饮食等表层符号,缺乏对文明基因的深度阐释;在话语转换端,教学实践中普遍缺失批

收稿日期:2025-6-20

基金项目:本文系江西省教改重点课题“面向‘讲好中国故事’能力提升的地方高校应用型翻译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与实践”(项目编号:JXJG-24-16-1)和上饶师院校级教改课题(项目编号:JG-23-16)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熊谊华(1978—),男,江西鹰潭人,上饶师范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英美文学、英语教学研究。

判性文化解码训练,导致学习者常陷入“概念转译陷阱”。例如,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简单译为“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实则消解了其蕴含的中华文明天下观;而课堂上对“military expansion”等西方话语的未批判性使用,更可能强化学生的认知定式。这种教学偏差最终导致国际传播中的“双重失真”:既难以建构具有阐释力的核心话语,又因跨文化认知赤字造成文化折扣效应。

三、思政在外语教学中的独特作用

课程思政与跨文化教学的深度融合,可以开创全球化时代语言教育的人文价值新范式。这种创新不仅在于教学策略的革新,更体现为知识体系的价值编码机制重构——通过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机融入跨文化认知过程,课程思政实现了语言符号系统与意识形态建设的辩证统一。当教师引导学生运用黄国文(2022)提出的三原则框架分析“一带一路”倡议的跨文化传播时,“价值取向原则”激活了批判性文化意识的认知潜能,“问题导向原则”转化为第三空间理论的文化协商实践,而“语言为本”原则确保这种价值传导符合语篇真实性标准。这种三重维度的理论互构,使《纽约时报》与《中国日报》关于“碳中和”议题的对比分析,既成为环境话语的修辞学训练场,更升华为解构西方“碳霸权”叙事的思想实验。

课程思政的独特作用在教师专业身份的重塑中显现出深层张力。传统外语教师的知识权威角色,Scollon指出在跨文化话语分析框架的介入下,裂变为动态的价值导航系统[:当解析教材中“universal values”的概念预设时,教师既是西方中心主义话语的解码者,又是中华文明价值内核的阐释者;在组织“中美抗疫措施辩论”的翻转课堂时,其角色从知识传递者转型为意义上的实践共同体构建者。这种身份转化使得海外研修经历不再局限于语言技能提升,而是通过批判反思循环,转化为课程思政资源的生成机制——比较莫言与马尔克斯文学叙事中的政治隐喻差异时,教师实质上在进行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的微观实践。

对于学习者而言,课程思政的介入使跨文化能力培养突破了文化维度理论的认识边界。当学生在APEC模拟会议中用“文明互鉴”框架替代“cultural differences”的刻板表述时,其话语实践已超越单纯的文化适应,进入批判性话语分析所指涉的意识形态博弈层面。这种转变本质上是价值观的具身化过程:通过“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多模态话语转换任务,语言符号的能指与所指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坐标系中重新锚定;在虚拟仿真项目跨文化商务谈判中,芯片制裁情景模拟不仅训练危机沟通策略,更使维护国家利益的话语自觉渗透至语言神经网络的建构过程。这种教育创新暗合课程符号理论——通过弱化知识分类与架构的刚性边界,使《国际商务谈判》课程中的文化立场反思日志,既成为跨文化敏感度的评估工具,也构成意识形态安全的能力监测系统。

这种教育范式重构的深层意义,在于对文化政治博弈的学术回应。当解构BBC涉疆报道的话语策略时,媒体素养训练与意识形态安全教育形成认知共振;当分析“债务陷阱论”的生成机制时,跨文化理论工具转化为抵御认知殖民的免疫屏障。

课程思政的独特价值,正在于其创造性地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转化为跨文化认知的元语言——既避免陷入文化本质主义的认知偏狭,又超越价值相对主义的立场暧昧,在文明对话与政治自觉之间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学智慧。这种智慧在“数字丝绸之路”的跨文化传播案例中得到具象化呈现:学生既能运用高/低语境理论解析技术话语的

文化差异,又能通过新能源合作叙事展现中国方案的文明价值,最终在语言能力提升与价值立场确立的共生关系中,完成全球化时代文化主体的建构性成长。

四、跨文化教学的思政路径

在全球知识生产体系深度变革的语境下,跨文化教学改革正面临着范式重构的历史性机遇。这种重构不仅源于数字化转型带来的技术冲击,更深植于文明对话时代的价值觉醒。传统以语言技能训练为核心的教学模式,在神经机器翻译突破98%语义保真度的技术现实面前,其工具理性导向的局限性日益凸显。当DeepL等AI翻译工具能瞬时完成商务信函的跨文化转换,当GPT-4可自动生成符合目标文化语境的营销文案,纯粹语言技能培养的教育价值遭遇根本性质疑。在此背景下,构建“认知解构—方法创新—价值引领”三位一体的能力培养模型,成为跨文化教学突破工具理性桎梏、重塑人文教育本质的必由之路。

在认知维度,文化分层教学框架的建构需要突破表层符号认知的窠臼,直指文明基因的解码与重构。教学内容系统划分为三个递进层级:显性的物质文化(如建筑服饰、节日仪式)、半隐性的制度文化(如社会组织形式、法律体系),以及深层的精神文化(如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以好莱坞电影《功夫熊猫》的教学解析为例,表层分析聚焦功夫招式、熊猫图腾等视觉符号的中国元素挪用;中层解构揭示个人英雄主义叙事对儒家集体主义伦理的置换;深层批判则指向东方主义视角下中国文化“他者化”的话语策略——通过将武侠文化的哲学内核简化为喜剧化动作奇观,实质完成了对中国精神文化的符号阉割。这种分层解码训练,使学生在《木兰》动画的跨文化改编比较中,能敏锐识别迪士尼将“孝道”重构为个人价值实现的叙事策略,进而理解文化转译背后的权力博弈。

数字人文技术的介入为这种认知深化提供了新的可能性。虚拟现实技术可构建紫禁城建筑群的三维模型,让学生在沉浸式体验中理解“天人合一”的空间哲学;语料库工具能对中美抗疫演讲进行话语网络分析,可视化呈现“集体主义—个人主义”的价值取向差异;情感计算技术则可量化检测学生在观看《疯狂动物城》种族隐喻片段时的认知冲突。这些技术手段与人文阐释的结合,使文化冰山理论从抽象模型转化为可操作的教学界面。

方法论层面的革新要求建立批判性文化对比的认知坐标系,这需要突破文化维度的平面化局限。我们可以构建“元概念—实践场—认知域”的三维分析框架:在元概念层面,对比中西时间观(循环时间VS线性时间)、空间观(关系空间VS实体空间)、伦理观(差序格局VS普遍主义)等文明基石的差异;在认知域层面,引入后殖民理论解构“现代性—传统性”的二元对立。例如在解析“一带一路”倡议的跨文化传播时,可引导学生运用文化中心理论,比较中国“和而不同”与西方“文明冲突论”的话语建构差异,同时通过非洲铁路工人访谈视频的批判性观看,解构西方媒体“债务陷阱”叙事的认知殖民逻辑。

这种批判性对比需要借助混合式教学模式的支撑。翻转课堂可设置“儒家伦理与康德义务论”的哲学辩论,要求学生运用正义论框架分析中西抗疫策略差异;慕课平台可整合哈佛正义课与清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课程资源,构建价值对话的数字场域;虚拟仿真项目则能再现WTO谈判中的文化冲突场景,训练学生在文明差异中维护国家利益的话语策略。

价值维度的重构要求课程思政实现从政治附加到价值

共生的范式转换。这需要建立“战略议题—文化符号—话语实践”的转化机制: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具象化为全球气候治理的协商模拟;把文化自信解码为故宫文创IP的跨文化传播案例,分析千里江山图数字展如何实现传统美学的当代转译;让总体国家安全观渗透至中美科技竞争议题研讨,通过华为5G技术标准的推广困境,理解技术话语权争夺的文化政治意涵。这种转化本质上是意识形态的具身化过程——当学生在模拟APEC会议中用文明互鉴框架替代文明冲突的陈旧范式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已内化为其跨文化交际的认知基模。

教师角色的进化是三位一体模型落地的关键枢纽。这需要实现从语言教练到文化阐释者的认知跃迁:首先,发展Scollon话语历史分析法的运用能力,能解码教材中民主、自由等概念的西方特定历史语境;其次,掌握全球文化流理论框架,在讲解跨国公司案例时揭示文化混杂性背后的权力关系;最终,建构双焦点认知透镜——既能运用Hall的高/低语境理论解析文化差异,又能基于马克思主义文化观进行价值批判。伯明翰大学教师的专业发展路径值得借鉴:通过批判反思工作坊分析BBC涉华报道的话语策略,教师将媒体素养训练转化为意识形态安全教育;借助全球课堂结对项目,在指导中美学生合作完成碳中和解决方案时,自然融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跨文化阐释。

人工智能时代的技术赋能不应弱化反而应强化跨文化教学的人文内核。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可构建文化立场分析模型,实时检测学生作文中的价值取向偏差;机器学习算法能模拟不同文化背景的虚拟对话者,为跨文化协商训练提供无限场景;区块链技术则可建立学习成果的文化能力数字护照,实现全球范围内的能力认证。但所有这些技术创新必须服务于人文价值的传承——当学生在元宇宙中重建圆明园数字孪生体时,技术体验应导向对文化创伤的历史反思;当AI助教提供24小时语言陪练时,其对话逻辑需植入文明对话的伦理准则。

跨文化教学改革的深层意义在于回应文明对话时代的根本命题:在技术理性席卷全球的今天,如何守护文化多样性的人类共同遗产?通过认知解构破除文化本质主义迷思,借助方法创新搭建文明互鉴桥梁,依托价值引领培育文化主体意识。当学生既能用Kramersch的第三空间理论分析《鱿鱼

游戏》的全球传播,又能基于费孝通的文化自觉理论阐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时,教育就完成了从文化适应到文明创新的认知革命。这种革命不仅重塑着跨文化教学的知识图谱,更在人工智能时代为人类文明的存续发展提供了教育学解决方案——在机器可以完美翻译语言的未来,唯有深刻的文化理解与价值自觉,才是人类区别于AI的核心竞争力。

五、结语

课程思政的介入重构了跨文化教学的价值逻辑:通过认知解构破除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规训,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文化分析的全过程;以方法创新突破工具理性的桎梏,构建批判性文化对比框架与混合式教学模式,推动语言技能、人文知识与批判思维的三维融合;借价值引领实现从“政治附加”到“价值共生”的范式转换,使跨文化能力培养回归文化主体性建构的本质。课程思政为跨文化教学锚定了培养具有文化自觉与价值判断能力的全球化人才的根本方向,推动外语教育从“语言工具训练”向“文明对话主体培育”的深层转型,可为“讲好中国故事”能力培养提供可操作的理论支撑与实践路径。

参考文献:

- [1] Skelton, T. & T. Allen. Introduction [A]. In T. Skelton & T. Allen (eds.). Culture and Global Change [M]. London: Routledge, 1999: 1-10.
- [2] Moon, D. G. Thinking about “culture” in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 In J. N. Martin, T. K. Nakayama & L. A. Flores (eds.). Readings in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Experiences and Contexts (2nd edition) [M]. Boston, MA: McGraw-Hill, 2002: 13-21.
- [3] 孙有中. 跨文化外语教学研究 [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21: 84.
- [4] 黄国文. 挖掘外语课程思政元素的切入点与原则 [J]. 外语教育研究前沿, 2022(2): 21-28.
- [5] Scollon, R. & S. W. Scollon. Discourse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 In D. Schiffrin, D. Tannen & H. E. Hamilton (eds.). The Handbook of Discourse Analysis [M]. Oxford: Blackwell, 2001: 538-547.

Research o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Intercultural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XIONG Yi-hua, CHENG Yan

(Shangrao Normal University, Shangrao Jiangxi 334001,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addresses the challenges of Western ideological infiltration and the dilemma of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in intercultural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proposing an integrated approach that incorporates curriculum-base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By deconstructing Western-centric norms through cognitive deconstruction, excavating the cultural genes of material culture, institutional culture, and spiritual culture at different levels, and deepening cultural decoding via digital technology empowerment, it constructs a three-principle framework of “value orientation—problem orientation—language primacy” to transform core socialist values into an intercultural cognitive meta-language. Meanwhile, it promot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teachers from “language coaches” to “cultural interpreters” cultivates students’ critical thinking and ability to translate Chinese discourse, and ultimately achieves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language education and cultural consciousness. This approach provides a systematic solution to addressing global cognitive competition and safeguarding cultural diversity.

Key words: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curriculum-base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责任编辑:范新菊)